

欽定四庫全書

晚宋詩歌与社会

勾承益 著

文天祥

撰

指南後錄一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欽定四庫全書

文山集
卷十九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晚宋诗歌与社会

勾承益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宋诗歌与社会/勾承益著.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 11

ISBN7-81065-892-1

I. 晚... II. 勾...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6070 号

晚宋诗歌与社会

勾承益 著

出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建设北路二段四号, 邮编: 610054)

责任编辑: 夏莹

发行: 新华书店

印刷: 成都嘉华印业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4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 2001 年 11 月第一版

印次: 200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7-81065-892-1/I·6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15.00 元

序

《晚宋诗歌与社会》是勾承益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他在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将其加以修订、充实完善，现在正式出版了。

宋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学界历来重视对宋史的研究。然而在宋史研究中，于晚宋时期（宋宁宗嘉定以后至宋亡）历史的研究尤为薄弱。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注意及此，在晚宋史研究上取得明显进展和成果，但对晚宋时期的文学以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系统研究却罕有。

诗歌是一种文学体裁，可以绘景叙人，亦可纪事言志，所以诗能证史，以补定文献记载之阙失；史亦能证诗，以求验诗之所出。因而，文史互证（包括诗史互证）是我国一种传统的成功治史方法，许多学者都做过不少工作，但是以诗证史，探讨晚宋的诗歌与社会，此前还没有人系统进行过。《晚宋诗歌与社会》一书所研究的课题，集中从文学的层面认识和剖析晚宋社会，具有学术价值和开拓意义。

勾承益博士1978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古代文化研究所，师从著名学者屈守元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在成都大学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从事中国文化课程教学和中国古代文史研究。1994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宋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由我担任指导教师。攻博期间，他着

重系统研读宋代史籍，努力熟悉宋史，并在晚宋历史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撰写的《晚宋诗歌与社会》学位论文，得到校内外 14 位同行专家的肯定与鼓励。并获得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致通过。这篇把晚宋时期的诗歌与社会结合研究的论文，表明了勾承益博士在文学、史学两个方面具有的坚实基础和文史兼治的研究能力，也表明了跨专业培养人才和进行科学研究的特点和优势。

本书所据资料丰富。现存晚宋史料既少又零散，以至成为晚宋史研究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勾承益博士在撰写过程中，对此用力甚勤，广为收集，深入发掘，翻阅了宋元之际的上百种诗集、文集和有关正史、野史、笔记等，并加以悉心梳理，认真辨析，从而使本书所论建立在丰富切实的基础之上。

本书对晚宋时期的社会矛盾、宋朝统治集团和统治政策以及宋亡以后的政治局面作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并将晚宋的诗歌及其作者放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作者把晚宋诗人（诗歌作者）群体分为江湖、官僚、学校三大类，逐类考察了这些群体的共性与个性，大量例举并具体剖析了这三类群体的诗词作品与当时社会中的权相专政、官吏腐败、军队羸弱、横征暴敛、经济衰颓、世风腐朽、生灵涂炭、国祚濒亡等现实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运用大量诗词作品，透析了不同诗人群体和不同的诗歌作者在反映历史中的不同作用，对晚宋的政治、经济、军事、世风、民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从文学的层面揭示出晚宋时期的社会状况，从而加深了对晚宋历史的认识。本书第五章，还集中考察了晚宋诗歌中最具有“以诗为史”的特点的纪事诗，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这类诗歌的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及他们所涉及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重大事件，努力解释其史学价值。本

书的第六章，对宋末遗民诗事迹及其诗歌作了考订，从讴歌爱国精神、弘扬优秀历史传统，汇集零散记载、提供宝贵史料和进行历史反思、总结历史经验三个方面论述了宋末遗民诗的历史地位和史学价值。

统观本书，文史兼治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创新精神和求实学风又是其明显特色。正是这样，作者才能取得这项研究成果，本书才能为晚宋史研究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当然也要看到，勾承益博士从事文史兼治还需要深入，而对宋史的系统深入研究尚为开端。我相信，只要再接再厉，继续发扬创新精神和求实学风，勾承益博士一定会取得更多的研究硕果。

在本书出版之际，勾承益博士要我写一篇序言，这是我不好推辞的。于是写了上述文字，用以表达我对本书正式出版的喜悦之情和祝贺之意，同时也以此为序。

胡昭曦

2002年2月

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前 言

一、关于选题的说明

本书的题目是《晚宋诗歌与社会》。

把晚宋的诗歌^①作为认识晚宋社会的历史材料来处理，这种尝试，在先前的史学著作中有不少零星的涉及。但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晚宋诗歌作一次系统的调查，并把它们当作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这项工作，先前还没有人作过。事实上，晚宋的诗歌（尤其是度宗末年以后的诗歌作品）所具备的史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作为晚宋历史的研究，本书这种尝试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诚然，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或者从中国诗歌史的角度看，晚宋的诗歌无论如何说不上辉煌，即便是与早些时候的江西诗派相对比，也会显得黯然失色。在晚宋时期，既没有出现像陈与义那样显赫一时的诗坛领袖，也没有出现像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陆游那样的大家。但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多元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审视晚宋的诗歌作品，结论就会大不一样，甚至可能截然相反。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宁宗以前的史籍比宁宗以后的史籍丰富得多，系统得多。尤其是度宗末年，亡国之际，当我们涉及这一段南宋历史的时候，不禁会为《水云集》、《指南录》精彩的诗史价值深感惊讶，以至我们在认识晚宋历史的时候，几乎不得不将它们作为必读的参考史料。而高斯得的《耻堂存稿》早已在历史上获得了“可补《奸臣传》之所遗”，

① 本文指广义的诗歌，因而包括诗、词两种体裁。

“可增《五行志》之所未备”和“洵足称诗史”^①的高度肯定。此外，对已经有不少史料记载的宝、绍间的那场震撼南宋的大规模“盐寇”事件，王迈、严羽、刘克庄等人却用诗歌形式为我们展示了一方新的园地。

作为文学的一种体裁，诗歌毕竟又有它的客观局限性。首先，和一切文学体裁一样，诗歌的第一特征在于作者的思维方式的形象性，这一特征决定了诗歌在反映历史的时候必然很难为我们提供具有较强归纳和抽象意义的历史资料。相反，作者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一些具体的零星的历史事件上面；其次，和一切文学体裁一样，诗歌的效应以调动读者的情感活动为特征，所以诗人在写作的时候，只是力图取得读者在感情方面的共鸣，他只希望读者跟他一道去体会历史，而并不试图引导读者去理性地认识历史。因为诗歌的本质并不是史籍，用文学理论的术语来说，诗歌的主要特征在于“表现”事实，而不在于“再现”事实，所以尽管我们可以从晚宋诗词中读到大量“再现”史实的叙事诗篇，并且因为它们直接的史料价值而使我们它们倍加重视，但是从总体情况看，晚宋诗歌什九以上的篇目是以抒发作者主观感情为主要内容，明显属于“表现”的范畴。因此诗歌给我们提供的资料，必然受到诗人在创作时的这种去取标准的局限。作为文学的这种特定的去取标准的结果，晚宋诗歌提供给我们的史料往往给我们留下无尽的遗憾。比如，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希望知道某一诗篇的具体背景，然而这往往可能是诗人意识中的赘疣。我们希望知道某一经济行为的具体数字，然而诗人提供给我们的却是一串令人膛目结舌的文字夸张。所以我们如果完全倚赖诗歌来认识历史，这种念头显然是片面的，也是幼稚的。这种情形，正同我们公认杜诗是“诗史”但是绝没有一个史学家会倚赖杜诗来研究安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4。

史之乱前后那一段唐史一样。

而且，在这本书的题目拟定之后，很快又遇到一个新问题，这就是如何处理文学与史学的关系。因为书中既要广泛涉及到诗歌，又要广泛涉及到社会，如果不事先在观念上有所确认，那么最终的结果就难以脱尽晚宋文学史或晚宋诗歌史的嫌疑，这种结局肯定不是作者所愿意的。另一方面，如果只把目光注意到晚宋社会生活的几个突出问题方面，而仅仅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诗歌作为一些可有可无的佐证，那么就根本无法实现通过本书的写作而系统地认识晚宋诗歌的史学价值这一初衷。

在对晚宋诗歌的大量搜集归类之后，经过认真的对比和分析，作者认为这本书的立足点应该放在晚宋诗歌中所广泛涉及的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上。换言之，这篇论文的基本定位应该是围绕着诗歌反映的社会展开探讨，这种探讨可以被看作是对诗歌内涵的发掘，然而它在本质上却更应该是对诗歌所反映的问题本身的探索。

因此，对晚宋诗歌作者群体的调查研究必然也是这篇论文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作者的生活经历、他们的思想活动以及他们的社会交际状况，这些因素必然能够成为帮助我们认识晚宋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重要参考。这样调查不但符合知人论事的原则，而且对诗人的研究正好能够让这篇论文的特色（从诗歌角度认识社会）得到有效的深化。

二、晚宋诗歌的概况

从迄今为止晚宋文学史研究的成果看，研究者一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江湖诗派和宋末遗民诗人的范围。然而，晚宋的诗坛却并不局限于此。本书作者在对晚宋诗歌进行了一次初步的调查之后，认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晚宋诗歌可以根据作者群体的差异分为江湖诗人作品、官僚诗人作品、学校诗人作品和遗民诗人作

品四大类。

（一）**江湖诗人作品**：关于江湖诗人的界定，在目前许多研究者中间已经形成一种大致相同看法：在成员构成上，可以《江湖集》为标准去取；在组成成份上，不可概以与庙堂相对立而简单化；在其作品内容方面，有明确的雅俗之分。

江湖诗人可以说代表着晚宋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个诗人阶层，他们“以诗会友”，“以诗行谒”，互相之间联成一个松散的关系网，虽有矛盾，但更多的却是互相扶持，互相鼓励或者互相利用，所以这一群体的诗歌内容十分复杂。不过从总体上看，却主要代表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从数量方面看，吟咏山水的作品占此群体作品总数的十之八九，接触现实问题的作品相对要少得多。江湖诗人中比较突出的作者有刘辰翁、刘克庄、叶茵、张蕴、胡仲弓、董嗣杲等。

（二）**官僚诗人作品**：晚宋时期，曾经在朝廷一度位居显官同时在诗歌创作中取得一定成就者，有程公许、魏了翁、王迈、袁甫、吴泳、包恢、高斯得、方逢辰等。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和处境，以及他们看待当时政治问题的态度，他们的诗歌与江湖派诗人之间显然存在着区别。在我们研究晚宋历史的时候，这部分人的作品所含史学价值超过其他各群体的作品。无论是针对国内矛盾，抑或是针对南北间对抗的问题，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往往埋藏在他们诗歌的字里行间。

（三）**学校诗人的作品**：对于晚宋朝政内部的任何大小事件，学校知识分子几乎无所不知，几乎总是要参与意见，而且他们往往通过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手段给统治集团造成极大的舆论压力。把他们的诗歌收集在一起，几乎可以看见晚宋时期许多政治事件的影子。而且由于他们的诗歌作品体现了很高的政治激情，在风格方面自由奔放，充分发挥了文学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很强的幽默和讽刺意味。正是因为这一特征，许多晚宋笔记野史和宋亡

以后的野史资料，都乐于搜集学校诗人的作品。与此同时，学校诗人的作品也为我们研究晚宋历史提供了许多其他诗人群体所不能提供的生动材料。从数量上看，学校诗人的作品并不算多，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其征引率却远远高于其他诗人群体的作品。

（四）遗民诗人的作品：在南宋亡国之际及亡国之后，一大批诗人从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角度记载他们的所见所闻。从他们当时的具体处境而言，有文天祥、汪元量、谢枋得等人从亡国之臣的角度来记录宋廷君臣在变故之际的经历，有谢翱、林景熙、刘辰翁等人从普通遗民的角度来记录亡国之际一般知识分子的心态和他们所进行的各种自我抉择，有舒岳祥、陈著、俞德邻等人从记述自身经历和记述历史的角度对宋亡之际战争破坏的反映。这些人的作品虽然在内容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是这些诗歌却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共同点，这就是诗歌充满诗人强烈的故国情思。这些遗民的作品，为后代史家了解宋末元初的社会状况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史料。

从数量上看，晚宋时期虽然只有七十余年，但是由于当时印刷业已有相当的发展，保留至今的诗歌作品竟然有四万首左右。除开中间占很大比例的那部分所谓“生活接触面较狭，对政治不甚关心”^①的吟风弄月的作品之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的诗篇在绝对数量上依旧是十分可观。这部分诗歌构成了我们从诗歌的角度认识晚宋社会的物质基础，随着我们对晚宋诗歌内涵的进一步深入发掘，必将有更多的诗歌会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① 游国恩等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第八章，第二节。

三、晚宋诗歌研究的概况

在传统的观念中，对于诗歌的研究通常属于文学的范畴，所以，到目前为止，对于晚宋诗歌的研究，基本上还局限在文学史研究的领域。就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目前情况而言，对于宋诗的研究都远不及唐诗。而就宋诗研究的范围而言，晚宋诗歌显得更为薄弱。1993年，张宏生在发表《江湖诗派研究》时，根据他的调查，“截至1989年1月止，建国以来国内报刊上发表的研究（按：指江湖诗派）的文章，除去欣赏和漫谈者外，只有三十四篇，其中十二篇是考证文章”^①。江湖诗派问题是文学史研究领域晚宋阶段的重镇，其研究情况尚且如此，其他方面的研究更加贫乏。就笔者不完全调查，在目前有关晚宋诗歌的研究文章和专著中，根据其研究的对象一般可以分为四类，其代表作大致如下：1. 对江湖诗派的研究。此类中比较突出的著述有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专著）、梁守中的《江西诗派与江湖诗派》、张继定的《论江湖派的形成和界定》、刘毅强的《南宋“江湖诗派”名辩——简论江湖诗派不足成派》；2. 对宋末几位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和词人的研究。这类著述中较突出的有谢桃枋的《黍离之感与桑梓之感——试论宋末婉约词的爱国主义思想》、陈增杰的《林景熙的生平和诗歌评价》、陈节的《试论郑思肖的爱国主义诗歌》、俞兆鹏的《谢枋得的爱国思想及其渊源与局限》、吴海发的《〈指南录〉编辑年代和〈后序〉的写作年代考辨》、王次登《元初遗民诗人的桃花源（月泉吟社及其诗）》；3. 对晚宋诗人的生平考证。这类著作较突出的有俞兆鹏的《谢枋得年谱》、杨德恩的《文天祥年谱》和《谢枋得年谱》、万绳南的《文天祥传》、俞兆鹏的《谢叠山先生系年要录》、周文康的《刘辰翁生卒年考辨》；4. 对晚宋诗词的整理。这

^① 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导言》。

类著述中较突出的有世界书局的《文天祥全集》(1936年)、中华书局的《霁山集》(1960年)、孔凡礼辑校的《增订湖山类稿》(1984年)、方勇辑校的《方风集》(1993年)、沙灵娜注释的《宋遗民词选注》(1995年)等。

此外,在关于整个宋代诗词研究的著作中,由于研究整体性的原则,晚宋诗词也是它们不可缺少的章节。但是,这些章节的研究深度一般都不及上述那些针对晚宋诗词的专门研究,多为泛泛而论,独到创见比较少。此类著述多以晚宋诗词的爱国精神为言,只有少数著作涉及到晚宋诗词的史学意义。在这类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有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这本著作在写到晚宋文学的时候,主要着力于诗歌,而且尽管文字不多,却已经开始对晚宋诗歌的历史学意义予以重视。还有赵仁珪的《宋诗纵横》,这部著作则正式提出了宋末诗歌应该从史学价值上予以重视的见解。书中写道:“宋亡之际,诗坛上出现了文天祥、汪元量、刘辰翁、林景熙、谢翱、郑思肖等一大批爱国诗人。文学史上一般将他们漫归之为爱国诗人。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这些爱国诗人的最大特点是将高度的纪实性与抒情性结合起来。他们的作品忠实地记录了亡国之际的历史,有高度的史学价值,堪与杜甫的诗史相比。但是他们的纪实又很少像杜甫那样是通过叙述性的描写来完成,而是把纪实融于抒情之中,以抒情融贯史实,故尔可称为纪实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爱国诗人。这就比泛泛地称他们为爱国诗人或遗民诗人要确切得多。”^①可以说,赵仁珪这种见解已经基本上涉及了晚宋诗歌的史学价值,所不足处,只是在于他的对象只限于宋末遗民一段。而这本《晚宋诗歌与社会》则以嘉定二年以来的诗歌作品为研究对象,并且完全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诗歌。因此,笔者的看法是,赵仁珪先生“很少像杜甫那样

^① 《宋诗纵横》第272~273页,中华书局出版。

通过叙述性的描写来完成”的结论，用于宋末则可，用于整个晚宋则不可，因为在整个晚宋诗坛内，事实上存在着大量以叙述性描写来完成的作品，如上文所涉及到的王迈、高斯得等人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

综上所述，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晚宋诗歌研究的成果既已不多，而从史学的角度对晚宋诗歌的研究则几近于空白。

四、本书的梗概

本书一共分为六章。

根据知人论事的原则，在对晚宋诗歌进行研究之前，我们应该对当时诗人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因此，根据晚宋时期的客观实际，本文指出晚宋诗人的群体情况以及各个群体的社会处境和基本思想情况。是为第一章。

由于权相专制和各阶层的反专制是晚宋社会各种内外矛盾中占主导地位的矛盾，因此本书把这方面的社会矛盾作品作为一个主要的探讨内容。结合诗歌作品，揭示出晚宋权相专政的客观程度，以及与此专制密切相关的台谏受制、言路壅蔽和用人唯私等政治问题。是为第二章。

在权相专制为主导的一系列政治弊端的影响下，晚宋时期社会风气至上而下的普遍败坏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在官吏作风方面，其腐败已经发展到了对一切行政过程产生破坏作用的程度。任何一个理论上成功的法令，一经吏手，最终都只能收到与政策初衷相反的结果。在军队风气方面，将领贪污，克剥士卒，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其严重者甚至往往发展到“不利御寇，而利为寇”的地步，宋亡之际的纷纷阵前倒戈，是晚宋军风腐败至极的体现。在士风方面，或消极颓废，不问政治；或寄情山水，吟弄风月；或走谒权门，为权臣奸相歌功颂德。这样的社会风气，是南宋王朝灭亡的又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对反映这方面社会问题

的诗歌的探讨，构成了本书的第三章。

晚宋诗歌中，也有一部分作品反映了令统治集团棘手的经济问题。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内十分敏感的土地问题、楮币问题、盐政问题、和籴问题，晚宋诗歌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是为本书第四章。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认识晚宋诗歌，本书作者发现晚宋的长篇纪事诗特别值得一提。这些长篇纪事诗中，有些从局部反映某一历史事件，有些则从历史的角度评述一系列重大事件，有些作品甚至堪称“有韵的纪事本末”。由于这些诗歌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所以，本文特以举例的形式对这类诗歌进行了局部性的探讨。是为第五章。

遗民诗是晚宋诗歌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遗民诗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它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二是它为晚宋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料。因此，对遗民诗歌的研究构成了本书的第六章。

毕竟，与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诗歌相对比，从历史角度的研究不但方法有所不同，而且结果也往往不尽相同。

例如，在先前的文学研究中，已经有人初步揭示了“江湖诗祸”与权相史弥远的冲突起因。^①但是却没有从史弥远的政治生涯中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样一来，“江湖诗祸”便成了一次权相与诗人之间的带很大偶然性的事件。但是，一旦我们用历史的方法把史弥远执政期间先后发生的数次与朝野知识分子之间因诗歌为导火线的事件串在一起，就会发现，“江湖诗祸”只不过是史弥远执政期间对知识分子进行的一系列打击措施中的一次。此时，我们才算抓住了史弥远行为的根本目的，原来同他当初为被韩侂胄排挤的理学人士平反一样，只不过是在于消除朝野的异己舆论及异

^① 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附录二《江湖诗祸考》。

己力量。在得到这个结论之后，我们对那段时期内史弥远排挤真德秀、魏了翁等执政大臣的行为也就愈加清楚了。

再如，对于学校诗人的讽刺诗歌，由于史料总是零星记载于各种笔记野史中，因而即使偶尔有人征引一两首这样的诗歌来作为某一史事的佐证，也很少有人从作者的角度去加以思考。一旦我们把学校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加以研究，就会发现晚宋时期，原来还有一支十分重要的舆论力量，这支力量几乎对当时每一次政治事件都有介入的迹象，而且往往成为晚宋时期执政者所畏惧的一种力量，竟连贾似道那样的权相也不得不对他们采用妥协拉拢的办法。

又如，对于宝庆、绍定年间江西、福建一带发生的震动朝野的“盐盗”事件，如果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那些纪事性的诗歌作品几乎很少具备所谓文学价值，但是一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一系列反映盐事的纪事诗立刻成了我们案头的圭璧。从文学作品价值多元性的理论着眼，对晚宋诗歌的历史学研究恰好是对晚宋文学研究的补充，用一句常用的话，就是填补了一个空白。事实上，如果不对客观存在的文学作品进行各种角度的穷尽性的调查研究，这样的文学研究本身就是有缺陷的研究。

然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晚宋诗歌作品进行探索，对于笔者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不但需要具备晚宋社会各方面的准备知识，同时还需要对大量晚宋诗歌的内在涵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对晚宋社会了解越深刻，对晚宋诗歌认识就越深刻；对晚宋诗歌认识越深刻，对晚社会的认识也会为此而更深。相反，如果其中一方面修养肤浅，另一方面也很难深入。固然，就认识晚宋社会这个目的而言，诗歌未必是唯一的途径，而且肯定不是主要的途径，但是诗歌毕竟是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分认识这部分文献，必然有利于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就作者的知识修养而言，这两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不足，进入本书的写作阶段之后，这种不足之感越发强烈。尤其是当文中涉及的晚宋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习俗以及各种典章制度等各个专门问题的时候，本书给作者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几乎要求作者成为晚宋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专家。显然，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要求，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一定难度的要求。因此本书的写作，只能是作者在这两方面目前水平的体现。缺陷之处，在所难免，对此，笔者只能寄希望于不断地探索，由诗入史，由史入诗，在这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逐渐提高自己的历史修养和诗歌修养，以期最终达到通过诗歌深入了解晚宋社会的目的。